

從學籍簿看日治末期公學校女生的學習狀況－以新竹公學校1942年學籍簿為中心*

許佩賢**

摘要

本文從新竹公學校（新興國民學校）1942年畢業之女學生的學籍資料，考察日本統治末期女學生的學習狀況。

1942年的畢業生，是1936年入學。這一年的女學生有將近八成都是適齡入學，中途退學的比例約15%。即使是家境貧困的家庭，也有不少人將女兒送到公學校，甚至讓她們讀完六年。不論男女童，每日出席率都是98%左右。由此可見，新教育穩定發展的現象。

公學校老師在學籍簿中登記學生們的家庭狀況、個人志向等，雖然文字簡短，但卻是極少數為女學生們的夢想與限制留下珍貴記錄的文件。女學生們因為家境、家庭狀況、個人興趣等編織對未來的夢想或人生規畫。有些人因為家境不得不收起夢想，做現實的考量；有些人清楚自己的個性及家庭需要，選擇未來職業；有些人了解家庭需要，將自己夢想延後數年。雖然只是片斷資料，但讓我們看到了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如何思考自己的未來。

關鍵詞：公學校、女學生、學籍簿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東亞的教育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5年11月13-14日），感謝與談人呂紹理教授及與會貴賓的意見；並感謝新竹國小張淑玲校長惠借資料。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日治時期新竹地區的近代教育與地方社會」（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3-001-）及「日治時期公學校檔案的整理與應用－從公學校檔案考察教育現場實況」（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3-031-MY2）成果之一部分。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壹、前言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發展，日本殖民政府留下許多相關資料，以往也有過不少相關研究，但是，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對於戰爭後期的情況，理解其實相當有限。日本雖然自統治伊始即引進近代學校制度，就學率及就學人口也持續成長，但是整個教育的普及大概要到1930年代中期以後才有比較明顯的進展。日本統治30年以後的1925年，臺灣學齡兒童就學率不到30%，其中女童僅13%；整體就學率超過50%要到1939年。1930年代以後的快速成長，固然與臺灣社會本身發展的條件有關，但也與日本的戰爭動員脫不了關係。為了快速培養能配合戰爭的人力、人心，擴大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是國家的當務之急。1939年臺灣總督府公布將於1943年起在臺灣實施義務教育，逐年增設班級及學校，以期能收容所有學齡兒童，同時對於「失學」青年，也增設各種講習機關來吸收。

1930年代後期到1945年日本統治結束這一段時期，對於臺灣教育乃至臺灣社會來說，都是變動很大的時期。然而，相較於1930年代中期以前，這一段時期殖民者所留下的「體系整然」的史料卻相對得少。以教育史領域來說，可以說是臺灣總督府教育施政報告書的《臺灣教育沿革誌》僅寫到1937年；總督府文教局的統計書《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也僅出版至1936年；文教局每年度的教育施政報告《臺灣の學校教育》出版至1941年。由於史料的欠缺，在教育、社會各方面都變動極大的1940年代，向來較少受到研究者注意。但是1940年代的研究極為重要，以教育史領域來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精確掌握這一個時期學校增設、變化的情況，我們便無法了解到底1945年8月以後國民黨政府接收時，臺灣教育的實際狀況。也就是說，1940年代前半期的研究，不僅是了解日本統治時期最後整個教育的走向與終點，也是了解戰前、戰後之連續性與斷裂性的重要線索。

由於缺乏統治者整理好的報告書類，要了解日本統治最後幾年的教育狀況，除了口述歷史、回憶文字以及少數報紙、雜誌之外，很重要的史料之一便

是留存在各個學校中、未出版的學校檔案。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學校檔案的應用，但還沒有人對學校檔案做全面性的介紹，應用上也還有許多不足之處。¹一般說來，學校中保存最多的資料，就是學生的學籍資料（學籍簿）。除此之外，部分學校留有學校沿革志、班級經營案、教案以及學校與主管機關的來往公文等，都是很好的歷史研究材料。²

公學校的學籍簿，是登錄學生個人資料的資料卡，每個學生入學就會得到一張，在校期間每年登錄成績等各項記錄，至畢業為止；若是中途退學，則將資料移至除籍簿。公學校規則中有規定學籍簿格式，然似乎各校有少許不同。³但無論是什麼格式，通常一定包括學生姓名、出生日期、住所、保護者姓名及職業等個人資料，以及六年間各科成績、身體檢查結果，也有老師評語等欄位，可以說是了解學生在學校學習狀況最直接的史料。

在本文中，筆者擬利用新竹公學校（今新竹市新竹國小）戰爭時期的學籍簿，來考察日本統治最後幾年學生就學的實際情形。新竹公學校日治時期的學籍簿自1911年起至1945年為止，有完整保存。戰後最初幾年，也都還延用日治時期學籍簿登錄學生成績狀況。其中我特別注意到女學生的學籍資料，因為比起男性，女性更少留下個人的資料。考慮到前述戰時教育研究的空白，在本文中，我以記錄較詳細的1942年新竹公學校女生的學籍簿為中心，來探討戰爭末期女學生的學習狀況。

新竹公學校前身為1896年成立的新竹國語傳習所，設置於明志書院（約在今新竹市西大路），1898年改制為新竹公學校，1906年學校遷至新竹孔廟（約位於今新竹市林森路）。1920年各地學校皆以地名編號命名，遂改名為新竹第一公學校。1937年學校遷至新興町（今興學街現址），1941年國民學校改制，改名為新興國民學校。為免繁雜，本文除特別需要強調校名之外，皆以一般熟知的「新竹公學校」來稱呼。

1 許佩賢，〈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年）〉，《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市：2014）7期，頁113-146。

2 參考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5年）。

3 黃翔璋，〈太平公學校學籍簿初探〉，發表於臺灣教育史研究會第90回例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5年10月3日）。

以下先說明1940年前後，整個新竹市的教育概況，其次分析學籍簿的各項記錄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最後，從女學生們的未來志願，來考察當時公學校女學生的夢想與限制。

貳、1940年前後新竹市內教育狀況⁴

臺灣總督府於1939年公布將自1943年起施行義務教育，根據總督府設定的目標，實施第一年的1943年入學率要達到80%，其後逐年提高，至1948年完成100%的就學率。總督府所設定的入學率，是以當年正好滿入學年齡（六歲）兒童計算（稱為適齡兒童）。由於當時七、八歲以後才入學一年級是很普遍的情形（稱為超齡兒童），如此一來自然也會排擠到適齡兒童的入學機會。為了提高學齡兒童入學率，總督府規定僅接受適齡兒童入學，而另外為超齡兒童設置「特設國語講習所」收容。新竹市於1940年前後設置了十所特設國語講習所，1941年總督府通過54萬圓的預算，預定在全島設置600餘所三年制的特設國語講習所，以收容超齡兒童。⁵特設國語講習所與一般國語講習所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特別設計來收容想進入公學校卻因年齡超過而被拒絕的人，其課程設計也準據公學校，就學期間為三年。⁶其經費與一般學校經費不同，是屬於社會教育費。⁷

本文所使用的學籍簿，是1942年畢業、也就是1936年入學者之學籍簿。1936年，新竹市內學齡兒童（指6-14歲）日本人共有2,357人，入學率100%；臺灣人學齡兒童有8,965人，入學率58%，其中男生73%，女生43%。比起同樣新竹州的街庄地區，這個入學率算是很高的，新竹州整體就學率是42%（男56%；女生27%）。除了城鄉差距之外，性別差距也很明顯，不論市或街庄，男女間都有30%左右的差距。義務教育制度實施前一年（1942年），新竹市調查市內入學適齡兒童數有日本人283名、臺灣人2,277名，其中98%確定要就

4 本節改寫自許佩賢，〈日本統治末期新竹市內的教育狀況〉，《竹塹文獻雜誌》（新竹市：2009）43期，頁40-51。因為是本論文的背景，因此修改轉錄於此。

5 〈全島に六百餘の特設國語講習所〉，《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8日，第3版。

6 〈特設國語講習所生徒募集〉，《新竹市報》807（1941年2月3日）。

7 見《新竹市報》中各年度預算、決算。

學。⁸至翌年確定入學人數時，人數稍有變動，其中日本人全數入學，臺灣人確實入學的占93.79%，遠超過新竹市役所的預期。⁹

之所以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成績，並不是在短短一兩年的成果，而是早在義務教育制度決定實施前幾年，各地方政府都已經在研擬對應可能即將實施的義務教育，逐年增設班級數，以提高收容量。1936年時，新竹市內有4所公學校及1所小學校。市內的日本人學齡兒童就學率幾達百分之百，而臺灣人方面的就學情形：1936年為58%，1938年為65%，1940年為73%。義務教育制度公布前後的班級數及學生數成長如下：1936年班級數80，本科學生5,080人。¹⁰1938年，班級數98，本科學生6,125人。¹¹1940年有139個班級，本科學生6,289人，收容量有著實的成長。¹²

1940年時，新竹市內的四所公學校中僅新竹第一公學校設有高等科；另有1所以日本人為主的新竹尋常高等小學校。同年，新竹師範學校新設，必須有可供實習的公學校，因此將住吉公學校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改為新竹第四公學校，翌年國民學校改制時，遷至新富町，改名為新富國民學校；另一部分仍稱住吉公學校，翌年國民學校改制時廢校，同時在原址新設新竹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¹³1941年以後，因應國民學校改制，新竹小學校改稱新竹國民學校；新竹（第一）公學校遂不能再用「新竹」為校名，而以所在地「新興町」為名，改稱新興國民學校；住吉公學校廢校；第二、第三、第四公學校則分別改為北門、高丘、新富國民學校；新竹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則改為附屬國民學校。1941年因市區擴張，新納入香山、舊港及鹽水3所公學校，後改為香山、南寮、鹽水國民學校；同時，在東門町新設新竹第二尋常小學校，後隨即改為東山國民學校，1942年遷至赤土崎。1943年另於赤土崎新設花園國民學校。¹⁴

8 〈國校新設學級增加 新竹市の義教對策成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1日，第4版。

9 〈就學率劃期的な好成绩 新竹市國民學校新年度入學兒童〉，《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日，第4版。

10 《新竹州第十六統計書（昭和十一年）》（新竹：新竹州，1938），頁36-37。

11 《新竹州第十八統計書（昭和十三年）》（新竹：新竹州，1940年），頁36-37。

12 《新竹州第二十統計書（昭和十五年）》（新竹：新竹州，1942年），頁42-43。1939年至1940年間班級數增加數量極大，但收容人數未見相應成長，其中或許有統計或登錄錯誤之處。

13 黃旺成監修，《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七教育志》第二冊（新竹縣：新竹縣政府，1976），頁141-142。

14 〈國校新設學級增加 新竹市の義教對策成る〉。

也就是說，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新竹市內共有8所二號表國民學校（原公學校）及3所一號表國民學校（原小學校）

初等教育以上有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各1所；實業學校2所（1940年設的新竹商業學校及1943年設的新竹工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1所（新竹家政女學校，1939年設，原為私立，1940年改為市立）。1942年北門國民學校、1943年香山國民學校、1944年新富國民學校、1945年高丘國民學校陸續增設高等科，增加市內公學校畢業生的升學機會。¹⁵

對於激增的班級數，總督府及各州廳都注意到教員不足的問題相當嚴重。總督府於1940年增設屏東、新竹兩所師範學校，第一年僅設一年的講習科，即是希望速成地培養更多教員。新竹州從1940年起就開始開設數梯次的臨時教員講習會，講習時間三個月，養成後成為代理教員。受講資格為：（1）實業補習學校畢業以上，思想堅實身體強健者；（2）中等學校三年以上半途退學者，思想堅實、身體強健者；（3）小公學校高等科卒業者及同等以上學力者，人品學力身體皆優秀者；（4）以上各項年齡滿18、未滿30歲者。¹⁶州當局雖然認知到「臨時養成結果，自然教員素質低下」，但是也別無他法。¹⁷類似的講習會於其後數年，幾乎每年都辦理數次，如1942年募集新竹高女補習科畢業生，接受三個月講習，採用為教員。¹⁸補充教員主要有幾個來源，以1943年為例，根據新竹州當局的統計，總共補充250名教師，其中全島按比例分配的師範學校畢業生100名，女學校畢業生70名，總督府主辦講習會修了生50名，州講習會修了生30名。¹⁹根據此時期報上的報導，各州廳經常都是在學年度開始前，勉強調度了足夠的教師，才鬆一口氣。而此時期新增設的許多實業補習學校，如新竹市內有新竹家政女學校，也成為重要的師資來源。

雖然可以看到市內教育機關的擴充，但是似乎不能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地方人士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向當局提出擴充教育機關的訴求。1940年起，地

15 黃旺成監修，《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七教育志》第二冊，頁40、55、123。

16 〈臨時教員養成講習會講習員募集〉，《新竹市報》775（1940年10月24日）。

17 〈教員心得の講習會 公學校高等科卒業者集め〉，《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2月3日，夕刊第2版。

18 〈新竹州短期教員養成講習會始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月13日，第3版。

19 〈新教員近く配置 新竹州助教員講習會強化〉，《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21日，夕刊第2版。

方人士對於政府的教育要求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增設公學校（或是增加班級）；二是增設公學校以上的教育機關，包括公學校高等科、實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還有設置新竹第二中學的要求。顯然，新竹市民對於初等教育及中等以上教育的需求都已經超過市當局提供的程度。

1940年地方人士向新竹市會要求儘速解決新設公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等事，聯名請願的委員是包括臺灣人及日本人的市議員。²⁰1942年地方人士組成新竹二中設置期成會，開會討論新設中學校的問題，甚至決議由新竹市及州內各郡捐款分攤70萬圓的工程費，²¹可見地方人士的決心。翌年3月真的籌集了8萬圓，購置土地，²²但是這個計畫，後來受到挫折。由於戰爭動員的需求，總督府方面更重視培養工業人才、技術人員，因此主導將二中設立計畫的資金，轉為開設工業學校的準備。新竹工業學校於1943年開校。²³

整體來說，1930年代後期以後，才是教育大幅擴充的時期，然而過去除了報紙及部分雜誌之外，我們對於1937年以後的教育實況了解很有限，女性的情況更是如此，因此以下擬以學籍簿的記錄為中心，考察日本統治末期公學校女學生的學習狀況。

參、學籍簿中的女學生

新竹公學校原本是男女兼收，1916年新竹女子公學校成立，新竹公學校遂改為只收男生，1935年起又開始招收女學生。但似乎大家還是喜歡把女兒送到女子公學校就讀，新竹（第一）公學校、第二公學校、第三公學校三校女生都不算多。例如，1936年，第一公學校及第二公學校各約有200多名女學生，第三公學校僅75人，但新竹女子公學校改制的住吉公學校（1935年起男女兼收），有1,174名女學生，比其他幾所男女兼收的公學校多上許多。

20 〈新竹市議の陳情團近く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3月5日，第7版。

21 〈新竹に第二中學新設要望昂る 有力者間で期成會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4月23日，第3版。
〈新竹二中設置要望の聲熾烈 設置期成會組織〉，《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0月27日，夕刊第2版。

22 〈第二中學實現へ 新竹市期成同盟會運動展開〉，《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18日，第4版。

23 〈新竹に工業學校 來年から開校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6月12日，夕刊第2版。

1936年時，新竹市內的4所公學校，共收容了1,804名女生，女生學齡兒童就學率為43%（男生為73%）。1940年時，新竹市內女生學齡兒童就學率為56%（男生為89%），有明顯提高。新竹市屬於市區，所以有較高的就學率；同樣1936年全新竹州的統計，學齡女童入學率僅27%。1944年，新竹市內適齡女童的就學率，已達到93.13%。²⁴

以現存新竹公學校的學籍簿來看，格式歷經幾次修改，使用最長時間的格式是「新竹第一公學校學籍簿」（附圖1）；1941年改制為國民學校時，同時也做了新的「新興國民學校學籍簿」，因此本文所使用的1942年畢業生學籍簿中，每位學生通常都有2種不同的學籍資料表。新竹第一公學校時代的學籍簿，兩面印刷，第一面是基本資料及各學年、各科成績，成績是十分制，第二面是身體檢查及評語。國民學校的學籍簿，單面印製，主要是成績表，以「優、良、可」評分，看起來是1941年臨時印製，所以只留有一年份成績登錄表格，但有較多空白欄位，讓導師填寫家庭環境、畢業後志願、性行概評、身體狀況等（附圖2）。裝訂在一起的資料中，另有一份「兒童成績及個性觀察票」，其中記錄的事項與學籍簿非常接近。「兒童成績及個性觀察票」自公學校時代一直沿用至國民學校時代，雙面印製，第一面是基本資料及成績欄，第二面有印製好、可圈選的操行、學習態度、家庭狀況、交友狀況、國語使用狀況等（附圖3）。

1942年畢業的女學生中有110位，其中有17名客家籍，1名中華民國籍，其餘都是福建籍。女學生們分在2班，第一班的導師是佐藤ツナエ（以下稱A班），第二班的導師是富山秀次（以下稱B班）。學籍簿的資料，多是由這兩位老師填寫。佐藤是福岡人，1939年擔任香山公學校教員心得（代用教師），1941年取得正式教師（訓導）資格，到新興國民學校任教，1944年到新竹家政女學校擔任助教諭。富山自1931年起即在新竹第一公學校擔任訓導，至1942年至新竹家政女學校擔任助教諭。²⁵從學籍簿登錄成績處所蓋的教

24 〈二號表就學率良好〉，《臺灣日日新報》，1944年3月7日，第4版。

25 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18年6月13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

師印章來看，佐藤是六年級才接任該班導師，班上有56名；富山則是自五年級起擔任導師，班上有54人。以下從學籍簿中考察幾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一、入學年齡

根據1922年公布的臺灣教育令，兒童年滿6歲至14歲為學齡，滿6歲以後的4月入學，因此，如果是4月2日以後出生者，有可能已經滿6歲了，但尚未入學。在學事統計中，都有一欄「已至學齡而未就學者」即是指此。

1942年3月的畢業生，應該是1936年4月1日以前滿6歲的兒童入學，因此適齡入學的話，應該是1929年4月2日至1930年4月1日出生者，若是1929年4月1日以前出生者，則是超齡兒童。依此標準來看，此年110名畢業生中，9歲入學者1名、8歲入學者6名、7歲入學者19名，其餘84名皆是滿6歲正好達學齡時入學。適齡兒童入學比例76%，算是相當高。全島平均的適齡兒童就學率，學事年報中並沒有統計。1943年臺灣總督府提供給本國政府關於義務教育實施的相關資料中，才看到此項調查，調查書是1943年作成，回遡至1938年。根據該報告書，全臺灣適齡兒童就學率，1938年是40%，後來逐步上升，1941年為75%，至1943年為90%，²⁶由此可見，76%在1936年是相當高的比例。²⁷

二、家庭背景

國民學校學籍簿有家庭環境一欄，佐藤很認真寫，敘述文字很多，富山則寫得較為簡略。從家庭環境來看，110人中，有11人的家長是在公家機關、銀行、學校等任職，屬於白領階級；貸地業（地主）有7人；其他的工作各式各樣，有些看起來，應該是收入還不錯的工作（如經商、蓮草公司老板或鴉片小賣〔零售〕等），但大部分的家長職業，看起來屬於中低收入者，例如苦力、日傭、魚販等。依據導師的記錄，至少有26人特別被記錄「家庭不豐裕」或是「極貧」者。但即使是家境困難的家庭，居然也是讓女兒讀公學校，甚至讓她

26 參見許佩賢，〈日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臺灣史研究》（臺北市：2013）20卷1期，頁127-167。

27 76%並不是1936年新竹市內所有適齡女童的入學率，而是以已入學、並且畢業者的入學率來計算，與總督府報告書中的統計，不能直接相比，但仍然具有比較價值，因此在此提出來。

們讀到畢業，由此可以看到臺灣社會教育觀的改變。

三、家庭中關係

110位畢業生中，有21位養女，2位媳婦仔，2位私生子；還有四女、七女、十一女等排行在三女以後者有20人。可見即使家裡女兒眾多，也讓女兒讀到畢業，而這些家庭也未必是富有家庭。這顯示讓家裡的女兒就讀公學校，在這時候已經是相當普遍的情形了。

四、中途退學者

公學校時期的學籍簿，有全班排名的記錄（席次），因此可以看到全班多少人，這個人排名第幾名。A班入學那年，有65人，二年級時有64人，三年級59人，四年級58人，五年級56人。六年級國民學校的學籍資料卡，雖然有「席次（排名）」的欄位，但依規定不再排名次，因此只能從畢業生總數來看，畢業時有56人。B班，一年級65人，二年級64人，三年級58人，四年級56人，五年級55人，六年級54人。其中也有數位從其他學校轉來，想必也有人從本校轉至他校。少掉的人，也許不完全是中途退學者，但即便如此，從人數來看，雖然每年遞減，但是中途退學者不到10人，與日本統治前半期比起來，此時中途退學人數並不算多。

五、每日出席狀況

此時期在學學生每日上學，也已經很穩定，學籍簿中有記載各學年學生出缺席日數，整體看來，出席狀況都很好，幾乎沒有看到長期缺席者，甚至有不少人有全勤記錄。根據學事年報的統計，1936年新竹市內公學校，兒童平均每日出席率男女皆在98.5%。²⁸

由以上幾點，可以概觀此時期女學生們就學的實際狀況。整體來說，到了日本統治的最後幾年，學齡女童就學、每日出席、並且讀完六年，幾乎已經是普遍情況，即便是家境不佳，或是有眾多女兒的家庭，幾乎都會讓女兒讀完六

28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五年報》（臺北：該局，1938年），頁104。

年公學校，由此可見民眾教育觀的改變。以下擬實際從老師在學籍簿中的記錄，進一步微觀的考察女學生們的學習狀況。

肆、女學生們的夢想與限制

學籍簿中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關於女學生們的未來志願。「兒童成績及個性觀察票」的第2頁最後，有一小欄是「志願」，兩班都是從四年級開始寫，四年級、五年級都有記錄，欄位小，只能記錄單詞（如「女學校」、「女中」、「未定」等）。到了六年級，國民學校學籍簿的資料卡，有很大的空間記述該名學生未來志願。從志願欄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女學生從四年級起，三年間的志願變化，也可以知道六年級畢業時，這些女學生們的諸多狀況。這份資料讓我們了解，公學校畢業的女生對自己未來的想像。

A班的佐藤老師記錄得非常仔細，不但記錄學生的希望，經常也描述家中狀況或現實條件，有時也並陳家長不同的期望，以及兩者之間的落差。例如，「（郭氏*鷗）希望能升學高等科，因父親反對而中止。其後希望成為給仕〔服務生或工友〕……」；「（洪氏*燕）本人希望從事洋裁，但身體不好，應該聽父親的意見，留在家幫忙家務……」；「（蔡氏*雲）提出希望進高等科，但沒有什麼機會。升學高等科是母親的意見，本人一向不太在意。畢業後希望至州廳擔任給仕」；「（戴氏*臻）本人希望在家幫人帶小孩，或是擔任銀行或郵局的給仕，但父兄希望她以後當產婆……」。除了記錄本人及家長的期望外，老師也常加上自己的判斷。例如，「（張氏*雲）希望升學高女，高女畢業後，想成為篤志看護婦。從本人的個性來看，不適合當看護婦，比較適合當老師。」「（許氏*）希望成為『女中〔家中幫傭〕』或『給仕』，之後學習洋裁，本人及父兄都同意。但身體不好，應該沒辦法當女中，給仕比較適當。」「（鄭氏*春）本人希望在官廳擔任給仕，父兄希望至少能幫助家庭收入。但考慮到本人性格及頭腦發育，我認為不適合給仕。」「（杜氏*英）希望升高等科。本人對洋裁有興趣，希望能學洋裁。個性溫順細心，很適合。」這些評論，或許也有老師個人的偏見也說不定，但從這些評語，我們看見了一

個、一個活生生、有個性的女性。

這些志願中出現了许多「職業」，有「看護婦（護士）」、「女中」、「給仕」、女工、車掌、打字員、事務員、洋裁、帶小孩（子守）、店員、產婆、電話接線生（交換手）、教師、國語講習所講師等。這些出現在學生志願中的職業名稱，可以說是女學生們在校期間所認識的社會職業。

由於有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不同時期的志願，六年級志願中，因為佐藤老師仔細記錄的關係，會出現第一志願、第二志願，或是本人志願、父兄志願，甚至也有老師認為適合她的職業，難以精確統計。不過可以看出，給仕出現的次數最多，總共有37次；其次是洋裁，有13次；第三是女中，有11次；第四是女工，有9次。其餘如照顧小孩、看護婦等也各有4-5次。

「給仕」通常指機關、公司的工友。大部分記錄，都只寫「給仕」，但佐藤班上六年級的記錄中也有不少人，表明想去州廳、公所、天然瓦斯研究所、銀行、郵局擔任給仕，明確指出想去工作的單位。另一方面，日治時期的報紙徵人欄，也經常出現飲食店徵求「女給仕」的廣告，這裡應該就是指在飲食店的服務生。

例如圖1的廣告，是商店徵求女給仕，而且要求要女性、公學校畢業。一般說來，報紙廣告的徵人欄，明確要求學歷的廣告不算多，但開始出現學歷要求，也顯示社會上開始有「學歷」的觀念，認為學歷是確保某種程度能力的標準。女性的話，通常是事務員、打字員等，會要求要高女畢業，有些廣告會註明要日本人或臺灣人。圖1雖然沒有表明是臺灣人，但徵求公學校畢業女性，對象應該就是臺灣人。

「女中」即在家幫傭的女性，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志願。戰前許多中產家庭，都會請女性在家幫忙。在日本本國，這些人在明治時代稱為下婢、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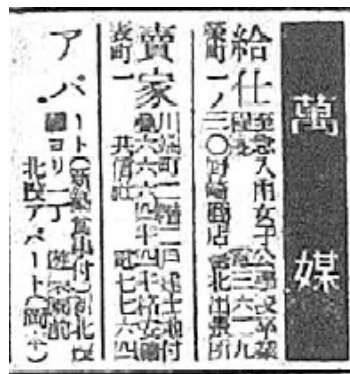


圖1：報紙徵人廣告一

出處：《臺灣日日新報》，
1942年1月4日，第3版。

大正以後改稱女中，在統計書上正式名稱是「家事使用人」。²⁹

過去有人研究過日治時期臺灣日本家庭中的沖繩籍女中，沖繩因距離臺灣很近，許多沖繩女孩，希望來臺北日本人家庭中當女中，除了可以賺錢之外，更可以學習禮儀，甚至還可以在當女中之餘，去念夜學。因此來臺北當女中的經驗，對沖繩女孩來說是很光采的資歷。³⁰在臺北的日本人家中，除了有日本籍的女中之外，應該也有人聘用臺灣籍的女孩在家中幫忙，這些女孩如果不懂日本語，就沒辦法溝通，因此，有公學校學歷的臺灣女孩，可以講簡單的日文，是很好的女中人選。當然，也有很多臺灣家庭，也請年輕女孩在家中幫忙。例如醫師陳石滿就回憶，她因工作忙，家裡同時請了幾位幫手。³¹王育德自傳中，也提過父親的三個太太各有一位女傭服侍。³²這種女中傳統，一直延續到戰後，戰後很多家庭也請人在家裡幫忙煮飯、帶小孩。對於女性來說，女中其實是很重要的「職業」，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什麼研究。



圖2：報紙徵人廣告二

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7月17日，第3版

圖2的徵人廣告中，有洋裁學院的廣告，有徵求內地人女給仕的廣告、產婆講習的廣告、女事務員、打字員的廣告，也有徵求女中的廣告，這些職業正就是出現在女學生的志願中的那些職業，可見女學生們對於社會現況有一定的

29 參考清水美知子，《〈女中〉イメージの家庭文化史》（京都：世界思想社，2004）。

30 金戶幸子，〈〈境界〉から捉える植民地臺灣の女性労働とエスニック関係：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臺灣への移動と「女中」労働との関連から〉，《歴史評論》（東京：2010）722期，頁19-33。

31 游鑑明，《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記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32 王育德，《王育德自傳》（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

認識。徵女中的廣告上寫著「內臺人不問，身體強健，要17歲至40歲」，由這裡可以確認有日本人家庭可能聘請臺籍女中。

學籍簿中有3人提到希望學習打字，成為事務員，但從報紙徵人廣告來看，許多事務員、打字員的徵人廣告，都要求要高女以上學歷，且有不少公司都要求要內地人才能應徵。對公學校畢業的臺灣女性來說，要向雇主證明自己有能力勝任打字員，並不是那麼容易，可能必須先到相關教育機構學習打字之後，才有機會成為打字員。

女中通常都是住在雇主家，但也有些女中是可以通勤上班。圖3的徵人廣告中，一丸旅館徵的女中，就是允許通勤。京町魚文，看起來應該是賣魚的店，也徵女中，本島人也可以。基隆的岩田食堂，徵求女給仕，要求十五、六歲以上的內地人，並寫明薪水是一個月25至30圓。

給仕及女中，可能需要基本識字能力、日文能力、基本禮節，但不需太高的學歷，其中，女中的話，特別需要良好的體力。對雇主來說，公學校畢業的女性應該是很適合。而對這些女性來說，自己可以輕鬆勝任，又可以領月薪，自然意願很高。

對公學校畢業生來說，升學是很重要的選項之一。公學校女生畢業後的升學管道有高等科、家政女學校、新竹高等女學校等選擇，當然高女是最困難的。新竹州內僅有一所新竹高等女學校，雖然是臺日共學，但臺籍學生不到3成，因此要升上高女，不僅要自己有意願、成績好、家境許可、家長同意，也要在少數的名額中競爭。如果無法順利升上高女，便只好退而求其次，就讀家政女學校。110人中，有2人的志願是說希望升學高女，如果不成，則希望進入家政女學校。新竹家政女學校成立於1939年，初成立時因新竹市經費不足，暫時由教化財團捐款，為私立學校，第二年就改為市立學校。家政女學校為1935年以後蓬勃發展的實業補習學校，由於修業年限比高女少一年，加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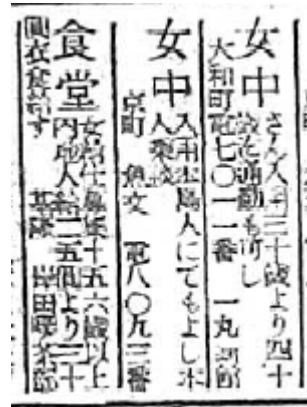


圖3：報紙徵人廣告三

出處：《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2月4日，第4版。

女收容量實在太有限，遂成為許多日、臺女性升學的重要機關。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自知能力、家境或興趣，無法或不想進入高女，但又想多念一點書，便以高等科為目標。³³

110人中，六年級表明有升學意願的有39人，超過3分之1的女學生希望畢業後繼續升學。其中有29人希望畢業後進入高等女學校就讀，3人希望就讀家政女學校（部分兩者都寫），7人希望進入高等科。從1942年高等科學籍簿來看，後來有9人進入同校高等科。

在學籍簿資料中可以看到，有意升學的女性，部分對自己的成績、家境都很有自信，就會斷然寫明志願是新竹高女；部分學生會寫「高女或是家政女學校」。老師的評語也會出現「雖然想升學高女，但恐怕有困難；如果是家政女學校的話，應該有希望。」。很明顯的，高女與家政女之間還是有著優先順序。過去我訪問過幾位新竹家政女學校畢業生，她們都表示自己是因為新竹高女沒考上，才去念家政女學校。

高女與家政女學校之外，希望升學高等科的人數也有不少。高等科附屬在公學校中，所需費用也比女學校低很多，成為許多想升學者的最佳選擇。1940年起，新竹市內各公學校陸續成立高等科。可見有相當大的升學需求，高等科的增設，透露了臺灣社會對更高學歷的要求。

以上的概略說明，可以得到一些整體的印象，但是，其實這份資料，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其中一個、一個女性隱微的故事。

那些很早就知道自己可以、也想要進女學校的，是什麼樣家庭的人呢？葉氏*治，從四年級起即志願入學女學校，父親是勸業銀行行員。老師評語說，「父母皆皇民化，乍看之下如日本人，是班上唯一家庭良好者。」何氏*娥，自四年級起即希望入學女學校，但老師覺得沒有機會（應該是成績不好），但有機會進家政女學校。她的父親是地主（貸地業），家裡富裕，兄長皆受中等教育，是皇民化家庭。」張氏*英「父親是藥種商，家境好，希望未來進

33 關於實業補習學校，可參考許佩賢，〈實業補習學校的成立與臺灣社會的教育欲求〉，《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社會的教育與社會》（新北市：衛城出版社，2015年），頁105-144。

醫專，當醫師」。張氏*靈，老師認為她「學業成績優良，家裡的人皆富向學心，氣質溫良，進新竹高女一定沒問題」。她的父親從事代書業，兄長皆專門學校以上。陳氏*鳳，父親是木材商；張氏*雲，父親從事商業；沈氏*蓮，父親是建築土木承包商；林氏*月，養父是製油業，母親是產婆；蘇氏*荊，家境富裕，父親是雜貨批發商，幾個哥哥都受中等教育。張氏*嬋，父親在製糖公司工作，家庭富裕，環境良好。陳氏*子，父親是新竹蓮草會社社長，家中富裕，兄長皆受中等教育。黃氏*，父親為公學校教師。彭氏*常，父親是司機，家人全部了解國語，住在內地式房子，家中常用國語。由此看來，絕大部分很早即認知道自己未來要升學女學校者，除了家境良好之外，家中若有兄長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她們也會有和兄長一樣畢業後繼續升學的想法。

除了這些有機會升學的天之驕女之外，更多女性在貧困中努力找尋自己的出路。汪氏*鸞的資料中記著「本年父死，家計有困難，想去學打字，以便幫助家計，很認真，努力的話應該可以成功。」黃氏*匏「想學洋裁，但身體不好，沒有辦法達成。」李氏*秋「希望就讀女學校，但身體不好，退而求其次，志願是高等科。」周氏*妹「家庭貧困，從四年級開始就以做女中為志，知道自己需幫忙家計。」吳氏*「希望入學女學校，但家庭不富裕，無法升學」，老師認為她頭腦很好，但也只能去做公所做給仕。倪氏*雲，四年級時志願是女中，五年級想當車掌，六年級想去商店或會社工作，只要有收入即可。在B班好幾年全班第一名的林氏*鶯，從五年級起希望做給仕，但老師認為她成績好，很會做事，想推薦她做國語講習所的老師。吳氏*貞的父兄希望她留在家裡兩三年再出去就業，但她希望畢業後立刻去臺北，「學習打字，成為事務員」，很清楚自己的希望。吳氏*英「家庭不富裕，想成為給仕幫助家計，將來三五年後，想去學裁縫。」

女學生們的未來志願，其實正是當時社會開放給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之新職業。如果環境許可，希望繼續升學的人有三個選擇，分別是高等女學校、家政女學校及公學校高等科。大部分的人則希望出社會，靠自己的力量就職。畢業直接可以就職的工作如女中、給仕，是最大多數人的志願；畢業後希望到洋

裁補習班、打字補習班學得一技之長的人也有不少。雖然學籍簿中只留下幾筆簡單的記述，但從以上有限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女學生們的夢想與限制。

伍、結論

本文利用戰爭時期公學校女學生的學籍資料，考察日本統治末期女學生的學習狀況。

1940年代前半期，也就是日本統治的最後幾年，由於缺少體系性的史料，以致於我們對這段時間的了解十分有限，透過本文的研究，可以初步解決過去研究史上的空白。

日本雖然自統治伊始即在臺灣引進近代教育，但至少要到1930年代以後才逐漸穩定。新教育穩定下來的重要指標之一，是學齡兒童入學率的提高，特別是女童入學率。其次是就學情況的穩定，已入學者每日上學成為習慣，不會因為家庭或地方社會年節活動等自動停學，中途退學者減少。

以新竹市來看，1936年女生學齡兒童入學率僅43%，雖然不算高，但已大幅高於農村地區。至1943年，適齡女童入學率已超過九成，不得不說在日本統治的最後十年有大幅成長。

從學籍簿來看，1936年入學的女童，將近八成都是適齡入學，中途退學的比例約15%。即使是家境貧困的家庭，也有不少人將女兒送到公學校，甚至讓她們讀完六年。不論男女童，每日出席率都是98%左右。由此可見，新教育穩定發展的現象。

公學校老師在學籍簿中登記學生們的家庭狀況、個人志向等，雖然文字簡短，但卻是極少數為女學生們的夢想與限制留下珍貴記錄的文件。女學生們因為家境、家庭狀況、個人興趣等編織對未來的夢想或人生規畫。有些人因為家境不得不收起夢想，做現實的考量；有些人清楚自己的個性及家庭需要，選擇未來職業；有些人了解家庭需要，將自己夢想延後數年。雖然只是片斷資料，但讓我們看到了受過基礎教育的女性，如何思考自己的未來。

本文一方面是對日治時期公學校學籍簿做初步的考察，一方面是利用這種過去未被充分利用的史料，來解明過去未被充分理解的1940年代前半的歷史。但僅以一年份的學籍資料，所能做的解釋自然有限，未來希望能更大規模的利用各種學校檔案，做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書目

- 《新竹市報》
- 《新竹州統計書》
- 《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查詢系統。
- 王育德，2002，《王育德自傳》。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 金戶幸子，2010，〈〈境界〉から捉える植民地臺灣の女性労働とエスニック関係——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臺灣への移動と「女中」労働との関連から〉，《歴史評論》（東京都）722：19-33。
- 清水美知子，2004，《〈女中〉イメージの家庭文化史》。京都：世界思想社。
- 許佩賢，2009，〈日本統治末期新竹市內的教育狀況〉，《竹塹文獻雜誌》（新竹市）43：40-51。
- 許佩賢，2013，〈日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0(1)：127-167。
- 許佩賢，2015，《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社會的教育與社會》。新北市：衛城出版社。
- 許佩賢，2014，〈臺灣教育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3年）〉，《師大臺灣史學報》7：113-146。
- 許佩賢，2005，《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出版社。
- 游鑑明，1994，《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記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黃旺成監修，1976，〈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七教育志〉第二冊。新竹：新竹縣政府。

黃翔瑋，2015，〈太平公學校學籍簿初探〉，發表於臺灣教育史研究會第90回例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0月3日。